

刘师培的春秋左传研究与家学传统

罗军凤

提 要 刘师培继承家学,治《春秋左氏传》,颇有“家法”。但刘师培没有续成家族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编纂工作,而董理汉儒旧注而成的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,偏离了家学传统;刘师培在家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“礼、事、义”三大课题,分别是对家学的传承、拓新与偏离;刘师培对《左传》义例的研究,尤其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本宗旨。刘师培对家学传统的承继与偏离,反映了晚清古文经学对乾嘉传统古文经学的深化与变革。

关键词 刘师培 春秋左传 家学

仪征刘氏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承乾嘉汉学的正统,欲通过语词训诂、典章制度之学追溯孔孟之道,是为家学。在晚清,仪征刘氏治春秋左传学,颇知治经“家法”,刘师培是难得一见的颇知治经门径与“家法”的经师。^① 乾嘉学术向来不以“家法”著称,“家法”在一定程度上是《公羊》经学所擅长,刘师培承家学而有“家法”,此一“家法”,不再是今文学重师承关系的“家法”,而是古文经学遭遇今文学之后深自壁垒的一种手段,表现为对《公羊》学说多自避讳,不孱杂,不肤引,以避免“自开其罅隙,与人以可攻”。^② 刘师培的“家法”意识使他与今文经学的抗争伊始,便站稳脚跟,不似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经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变,一直在苦苦寻求与今文经学抗争的立足点。

刘师培提出《左传》“礼”、“事”、“例”三大课题,其实在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中,就已出现明显的迹象。《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宣称“释《春秋》必以周礼明之”,《春秋》之“义”必“依文与事言之”,所以《旧注疏证》阐发礼制、考订史事,以语辞训诂、典章制度之疏证见长,不敷言微言大义,体现的是“求道于典章制度”的乾嘉遗风。《旧注疏证》虽不云“义”,但已提出“例”的研究课题。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《传》“谓之礼经”条下云:“今证经传,专释训诂名物典章,而不言例。另为《五十凡例表》,皆以《左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,其所不知,概从阙如。”^③ 所谓“例”,即以条例的形式概括褒贬之“义”,这与《旧注疏证》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不仅在治经方法上迥异,而且在著作形式上,

^① 可参见 1907 年刘师培与端方的通信“师培淮南下士,束发受书,勉承先业。略窥治经家法,旁及训故典章之学。”转引自万仕国《刘师培年谱》,扬州:广陵书社 2003 年版,第 140 页。

^② 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《传》“谓之礼经”条“贾、服间以《公》、《谷》释《左传》,是自开其罅隙,与人以可攻。”北京: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,第 42 页。

^③ 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,第 42 页。

也应与疏证体大不相同,故亦不便加入进《旧注疏证》中。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在治经课题与治经方法上体现的是乾嘉学风,《旧注疏证》即在这个意义上是《春秋左传》学领域乾嘉学术的集大成之作,而刘文淇提出的“例”的课题,则偏离了乾嘉学风,但却与嘉、道之际,诸多学者欲研究《左传》之“例”的心迹相合。《左传》“例”的课题的提出,与公羊学的兴起有至密切的联系。《公羊》经学讥讪古文经学琐屑短钉,非关大义,并且以其“义例”治经的方式,显现出理论的逻辑性,一时吸引了许多信众。今文经学大势流行之后,古文经学亦寻求与《公羊》今文经学相对抗的理论体系,以阐述乾嘉汉学一直未表著文字的微言大义。刘文淇所提出的“以《左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”的原则,即属意于与今文经学各自为营,今古文相争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。刘文淇于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之外另作的《五十凡例表》,不传于世。其子刘毓崧曾作《春秋左氏传大义》,探讨《左传》的义理,亦无传于世。著作无表,但勿庸置疑,刘氏家族已经把“例”的研究以及义理的阐发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。刘师培的家学传统中既有乾嘉学术的旧有传统,又有超出旧传统的内容。

在晚清,刘师培是少数几个继承乾嘉汉学传统的学者之一,他潜心于利用东汉古注注释《左传》,不仅用东汉古注作语辞训诂,亦用东汉古注阐明《左传》义例。利用东汉古注治经,由惠栋首倡,在乾嘉时期蔚为风气,但乾嘉学者一般利用东汉古注作“典章制度”、语辞训诂之学,而刘师培开始发掘不被乾嘉学者所重视的东汉古注中的义例之学,以适应与今文学抗争的需要。而且刘师培重新阐释了《左传》“礼”、“事”、“例”等三大课题,重新阐释的出发点在于与今文学抗争。和刘氏三代萃一生之力疏证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不同,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所成就,不在《左传》“礼”和“事”的疏证上,而在《左传》“例”的发明上,更为重要的是,刘师培在更深、更广的程度上与今文学相抗争,提出了许多有开创性的课题,这无疑使他成为晚清春秋左传学的殿军。

刘师培继承了刘氏家族的治经“家法”,这使他在今古文之争中立足点鲜明,但由于学术趣味与治学方法的改变,他未能续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家族伟业,在家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左传学“礼、事、义”三大课题,分别是对家学的传承、拓新与偏离,尤其在《左传》的义例问题上,刘师培的治经方法及最终成果,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本宗旨。

一 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工作

刘师培的先祖留下《左氏长编》八十卷七大本,但后来不知去向,刘师培曾经自言赍续家传《春秋》绪业,他的叔辈亦以为他在戡理《左氏长编》,但后来,先人的《左氏长编》不知去向,刘师培终究不见有片言只语的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存世,所以有人说刘师培泛滥无所归,家学早已不闻不问,对他未续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颇有苛责。^①而又有人认为《刘申叔遗书》内所收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为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雏形,实则《古经旧注疏证》另成统系,与家学已无关联。笔者于此欲申辨者,在刘师培确实有整理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意图,而彼时《左氏长编》已失;而被人误解为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续作的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,其实是对家学的偏离。

^① 杨向奎《清儒学案新编》(六),济南:齐鲁书社1994年版,第433页。

刘师培虽然没有续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，但从章太炎与刘师培的书信中，我们可知刘师培在二人认识之初，即 1903 年，即在准备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旧注疏证工作。章氏劝刘师培续继祖业，为刘师培作新疏提供了很多建议，霭霭长者，拳拳教诲之心，溢于言表。1903 年第 2 书云：“若乃《正义》之作，亮有数难，刘、许诸家，多义例而少训故，然其例犹大体相似；仲师、子慎多训故而少义例，其训故又多乖异，侍中兼之，亦申己义。治经者既贵其通，亦贵有别，不容以仲师之言蔽子骏，以侍中之言蔽仲师，家有异义，又不容唯阿两可。至夫古义无徵，而新说未凿者，无妨于疏中特下己意，乃不为家法所困。”^①章氏所指《正义》即指他想看而未曾寓目的《左传》新疏——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。此书当时未付刊印，世人知之但不得见，章氏径以《正义》称之。章氏为刘师培分析东汉刘歆、许慎、郑众、贾逵、服虔诸儒之说，辨明新疏所应持的著述体例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刘师培确实在做《疏证》，但汉注采辑未备，刘氏面临着甄别去取的问题。可以肯定，刘文淇手编《左氏长编》于贾、服、郑三家义为多，多不涉及刘贾、许、颖等人的义例。若《左氏长编》盈握在手，章氏所建言汉注各家长短则落为空言；若刘师培不是在做《旧注疏证》，章氏所云“《正义》之作”则言无所指，刘师培采辑汉注亦属多举。而 1903 年的刘师培正在做早期的资料清理工作，则先祖《左氏长编》于此时已不存于世。刘师培的叔父刘富曾云刘师培曾经“戡理《左氏长编》”，大抵指刘师培自行编理《左氏长编》。

从刘师培拟采用的汉儒旧说看，刘师培治《左传》，已超越其家学。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以东汉贾、服、郑三家为主，而刘师培除贾逵、服虔以外，还注重刘歆、许慎、颖容等人。刘许贾颖诸家的相同之处，诚如章氏所言，多言义例、褒贬，而刘师培对这些义例颇为赞许。《读左答记》云贾逵义例来自先师，左传学所本有，要之，东汉其它诸家义例也可如此看。表面上看，刘师培采辑汉注，继承的是家学的路子，但实际上暗地里废弃了家学采汉儒旧注以明训诂典章的初衷，而注目于汉儒训诂中的义例体系，所以重训诂典章的郑注不予论列，贾、颖、许、容诸家取而代之。

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是刘师培采用义例颇多的刘、贾、许、颖诸家说的具体实践。我们不难看出《古经旧注疏证》与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不同之处，《古经旧注疏证》关注家学所不关注的事情褒贬，传统古文经学寓褒贬于叙事的取向，被善言褒贬的汉注代替。刘师培的汉注辑采，已偏重义例而非训诂。

1906 年岁末第 5 书，章氏云刘师培未将精力全放在家学左传学身上，告诫他“泛滥群籍，未若专精一家。”劝勉他当以家传贾、服之学为重，“载德年力鼎盛，必当比辑成书”，不宜学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“率尔操觚，自矜博览而已。”^②1906 年冬，章氏第 6 书又一次提起各家汉注的优劣：“汉世以《左氏》名者，不止贾、服二公，贾（逵）、马（迁）、二刘，下及司农（按：郑众）父子，其训诂皆略可诿次。前四公同睹古文，义据确凿，二郑、贾、服渐有粗疏。所据多家，而又摭拾不具，非如毛、郑二公原书具在，是当择其善者，列为之注，其异说

① 章太炎《章太炎再与刘申叔书》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3 年第 1 号，收入《太炎文录》卷 2 时，改题《与刘光汉书》。章太炎与刘师培的 7 通书信，其内容及顺序安排，均遵照李勇编《章太炎书信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② 章太炎《某君与某书》，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7 年 1 月 4 日，丙午年第 12 号。

则于疏中驳之可也。其先儒所未具者,自下己说,列于疏中可也。”^①刘氏家学以贾服之学三者为中坚,章太炎提出贾服亦未尽汉学之全部,故劝他做新疏时,还要考虑西汉刘向父子、司马迁、贾谊,指出新疏所据汉注有多家,“而又摭拾不具”,当“择其善者,列为之注”,可进一步证明刘文淇的《左氏长编》已不存于世。章太炎在系狱三年之后与刘师培老调重谈,也可证刘师培的新疏工作并无实质进展。而刘师培尝作《春秋古经笺》,笺,顾名思义,简明扼要,自然不及《疏证》的详瞻,章氏以刘氏《旧注疏证》之家学期待于刘师培,故责刘氏“率尔操觚”,殊不知刘师培在此时,已经发生学术的转向,以明《春秋》的褒贬义例为尚,已不再专心于训诂语词的训释。

刘师培最终未如章太炎所期,没有著成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,最为重要的原因乃在他作为古文经师,治学方法与治学旨趣已经发生转移。刘氏先族虽然以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正》取声扬名,但刘师培对《疏正》所采取的训诂体制的评价不甚高:“前世为类书者(《御览》、《类聚》之类),散群书于各类书之中;清世为义疏者(正义)之类,又散各类书于经句之下。”^②对训诂的零碎不成体系公然叫板,此处虽然不是针对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,但《疏证》确是其反对的著述体制无疑。刘师培反感训诂类著作,相反,对于宋代理学和清代《公羊》经学的义理贯通以及条例森严,倒很是推崇,《近儒学术体系》《南北学派不同论》等篇章中有所表现。加之西学的传入,使刘师培具有更多学科体制的意识,早期《周代学术史序》、《经学教科书》等著作即是他自觉运用西方学科的意识归纳中国学术的著作。观刘氏著作,注疏类的著作绝无仅有,《春秋古经笺》虽是旧笺,但最终亦形成总结性的文字,即《春秋左氏传日月例考》等篇;采取旧式训释体制的著作——《春秋旧经疏证》仅成三纸,便已煞尾。刘氏为与今文学抗争,且为古文经学寻找出路,使用最多的是著述体式的著作,经常就一个论题,相对集中地予以阐发,这种著述方法,已接近现代学术的著述体制,而与传统古文经学体制迥异。

传统古文经学为考订而考订的训诂著作在刘师培处已无迹可寻,刘师培将自己与传统古文经学分道扬镳的关键解释为民族革命。1907年,刘师培第二次与端方通信,这样讲自己年青时投身政治的热情:

师培淮南下士,束发受书,勉承先业。略窥治经家法,旁及训故典章之学。意欲董理故籍,疏通证明,以步戴、段、阮、王之后。适时值艰虞,革命之说播于申江,揭民族主义为标,托言光复旧物。师培年未逾冠,不察其诬,窃以中外华夷之辨,默合于麟经。又嗜读明季佚史,以国朝入关之初,行军或流于惨酷,辄废书兴叹,私蓄排满之心。此虽由于《苏报》之激刺,然亦以家庭多难,泯其乐生之念,欲借此以祈遘死也。”^③

虽然对往昔革命一笔否定,但是弃传统古文经学,投身于书桌之外的心迹仍表露得很清楚,这段史料不容我们置疑。刘师培投身于革命,最主要的事件是1903年与章太炎在上海订交,彼时,正是“革命之言播于申江”,刘改名光汉,即“托言光复旧物”的意思,为种族

① 章太炎《某君与某书》,原载《国粹学报》1907年2月2日,丙午年第13号。

② 蒙文通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《廖季平年谱》,成都:巴蜀书社1985年版,第148页。

③ 转引自万仕国《刘师培年谱》,第140页。

革命的信念所致。1903 年,刘与章氏通信时犹论及“左传正义”的著述体例,而此后“左传正义”的工作遂湮没无闻,不能不说是身系革命的影响。因为刘师培卷于政治的风波之中,颠沛流离,兼《左氏长编》之不存,缺少编纂的客观便利条件,这使刘师培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的工作。

二 左传学三大课题的提出

刘师培提出复兴左氏学的三个研究课题:即礼、事、例。这三个课题的提出,是为了应对左氏学不盛的情形,最终目的是打破今文学家的谰言,重建《左传》古文学的兴盛局面。这三个课题的提出,是其家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致用。《左传》学三个课题本是其家学的组成部分,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虽没有明文提出《左传》研究的三个课题,但事实上,刘文淇将贾、服、郑三家汉注的疏证工作分为三大类:即礼、事、例,试分别言之如下:

1、礼。刘文淇奉行“典章制度明,则其道自明”的宗旨,将“礼”作为圣人微言大义的载体,“周礼者,文王基之,武王作之,周公成之,周礼明,而后乱臣贼子乃始知惧。”^①则周礼是实现《春秋》微言大义之大端,刘文淇“说《春秋》必以周礼明之”,即为此。这一点与今文经学言“殷”之礼处于敌对。

2、事。事是《左传》的主体,也是《疏证》名物、地理训诂的趋归。刘氏奉行“事明则褒贬自见”的信条,对《左传》之事的疏证,止于语词训诂;这是古文经学的传统治学领域。

3、例。例与礼、事的研究持不一样的方法。“礼”、“事”的研究坚持历史再现的原则,而“例”则直接阐发《左传》的褒贬书法,与《疏证》的全书著述体例颇有不合,刘文淇打算另行撰述,故《疏证》尚未及此。传统古文经学未注意及“例”,刘氏对“例”的注目,并把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,受今文经学义例研究的启发。

刘师培对《左传》三大课题的研究,对家学有承继,有拓新,亦有偏离,试分别言之:

“礼”的研究。与家学毫无二致,不过刘师培的主张更明确化。1913 年,刘师培著《春秋正名》一文,认为自古“史记”与“周礼”同名,那么,在春秋学中,全面阐发礼制则是题中应有之义。除了在《左传》中寻找与《周官》相关的礼制并证二者不伪之外,还要在《左传》中搜寻佚礼,以全面恢复春秋时的礼制。

“事”的研究。刘师培的“事”的研究,不再表现为注疏体制的言辞训诂,而转为搜辑先秦两汉诸典籍中所征引《左传》之事,以明《左传》的流传,证《左传》之不伪。“事”的研究这一项,刘师培没有注疏体式的著作,但《司马迁述左传序例》、《左传学行于西汉考》、《周秦诸子传左传考》等篇章考证《左传》在先秦、西汉的流传考,颇为经典。

“例”的研究。以《左传》之“例”为代表的微言大义的研究在 1910 年以后,几乎成了刘师培《左传》学研究的全部。1909 年至 1911 年,刘师培相继写了《春秋古经笺》《春秋古经旧注疏证》等研究春秋褒贬的著作,1912 年《春秋左氏传答问》等不离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。1910 年起,刘师培开始发表他的义例研究成果,1910 作《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》,1912 年作《春秋左氏传古例考序略》(收入《刘申叔遗书》时,改题为《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》),1913 年发表《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》,1916 年著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,民国期间还著《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》,一系列研究义例的文章,力图通过“条例”系统地、科学地阐

^① 刘文淇等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。

释《左传》的微言大义。

通过对比可知,刘氏家学中,《左传》三个课题中,“礼”直接针对《公羊》学说,“例”受《公羊》学说启发,但无著作传世,“事”的研究遵循古文经学的旧有学术规范,与公羊学的论争无直接关联,而刘师培的三大课题,无一不与《公羊》经学的对抗有关。刘师培以春秋时期的礼制对抗《公羊》经学的礼,以《左传》的授受流传证《左传》之不伪,以《左传》的微言大义对抗《公羊》学说的微言大义,刘师培对家学三大课题的调整,体现了刘师培面对日益强大的今文经学时,所强化的古文经师的“家法”。

三 《左传》义例的探讨

对《左传》义例的探讨是家学的研究课题之一,刘氏先祖没有来得及义例的研究,刘师培的义例研究偏离了家学规定的旧路。刘文淇认为贾服等人杂引《公羊》之例为自晦其学,与人以可攻,^①不为贾服等人讳,但刘师培却认为汉儒阐发的义例亦本《左传》原有,东汉诸儒的义例被珍视。《读左割记》:

注《左传》者,惟贾君于《传》文所载凡例外,稍明义例,后儒议其杂入《公》《穀》之义例,为自淆家法,实则《左氏》自有其义而贾君传之,非贾君自为合并也。^②

此语出自乃祖刘文淇,但已暗渡陈仓。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注例之三:

褒讳抑损之义,三传所传《春秋》皆有之。注《左氏》者,惟贾君尚存梗概,后人议其杂入《公》《穀》之说为自淆家法。实则《左氏》本有其义,而贾君传之,非贾君好为合并也。^③

刘文淇所言在“褒讳贬损”,即随事而生的道德评判,认为《左传》与《公羊》《穀梁》都有道德评判,三传对同一事件的看法有相同之处,同出于先秦春秋学,不存在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。刘师培所论专在“义例”,与刘文淇所言“褒讳贬损”,一为经学,一为史学,属不同的研究领域。褒讳贬损,附属于史事,义例,以理论体系自重,研治的方法和态度,都不能相同。刘师培变通刘文淇的话而私下里讲经学的理论体系,已经偏离家学的旧路。

在具体的问题上,刘师培与刘文淇的阐释已有根本不同,举《左传》宣公元年经文“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”的训释为例。此句服虔有注,云:“古者,一礼不备,贞女不从,故《诗》云‘虽速我讼,亦不女从。’宣公既以丧娶,夫人从,亦非礼。故不称氏,见略贱之也。”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考证服氏“非礼”之说本《左传》先师,并非效《公》《穀》二传“讥贬姜氏”之说;三传对此事都著贬辞,但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从书法发微言大义,《旧注疏证》从礼制讲褒贬。刘师培《春秋古经笺》于此句经文不问服虔之说的出处来源,而着意发挥《春秋》的书法、凡例,明此处夫人姜氏去氏为贬。这种治经方法与家学相去何其远,而与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何其近。《春秋古经笺》:

凡卿为君逆例,书以‘夫人至’,以从下以上之词,故必去族。公子翬逆女,不书‘以至’者,以公受之于让,此变例也。妇者,有姑之词,不书‘妇姜氏’者,公以丧娶,

① 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七年“谓之礼经”条下,第42页。

② 刘师培《读左割记》。见刘师培著《刘申叔遗书》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,第293页。

③ 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卷首“注例”。

夫人不能以礼自固,故《经》贬夫人,以著公恶。哀姜丧归,去姜书氏,此则去氏书姜,彼为罪轻之贬,此为略贱之称,其义固互明也。夫人至,例月。

我们可以将《公羊》《穀梁》此段的传文罗列,以资比较:

《公羊传》:夫人何以不称姜氏?贬。曷为贬?讥丧娶也。丧娶者,公也,则曷为贬夫人?内无贬于公之过也。内无贬,于公之过,则曷为贬夫人?夫人与公一体也。(注:耻辱与公共之,夫人贬则公恶明矣,去氏,比于去姜,差轻可言,故不讳贬夫人。)

《穀梁传》:传其不言氏,丧未比,故略之也。(注:夫人不能以礼自固,故与有贬。)其曰:妇缘姑言之之辞也。遂之挈由上致之也。(注:上谓宣公)

《春秋古经笺》:“夫人不能以礼自固”,出自《穀梁》,“《经》贬夫人,以著公恶”,出自《公羊》。刘氏于此处的书法阐释可谓周详:有凡例,又有变例补充说明之;有去氏之贬,又用书氏之贬补充说明之,则《春秋》之例条理颇具,在在浑通。可以说,汉儒义例之说,经刘师培匠心独具地运用,变得圆通融贯。之所以能融通,要在刘师培借鉴了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的义例,运之以古文经学“以经释经”时通贯前后的方法,所以刘氏义例,较今文义例更具条理,更有逻辑。刘文淇的家学,排斥杂今文之说的汉儒义例学,即便汉儒与今文义例似有关联的,都要多方证明其来自《左氏》先师,而非采自《公羊》《穀梁》,刘师培却拣起了汉儒义例之说,明显采今文义例,偏离其家学,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刘师培偏离家学做义例研究,源于他的学术趣味,不甚重汉儒训诂,却重汉儒义例。章太炎说刘师培“雅好闻望,不台于先。”^①这里说刘师培“不台于先”,善守家学,当专指刘用汉儒旧说,与家学同,这点与章氏融通汉注与魏晋旧注有异。同是治理汉儒旧注,刘氏家学不取义例,刘师培主取义例,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传统古文经学专讲训诂而不言义理,刘师培治学,汉宋兼采,并不排斥义理。但刘氏的义理,绝非宋学的义理。刘师培认为,宋儒之章句学“疏于考核,例非汉儒之例,说非汉儒之说,图非汉儒之图”,^②以汉儒之学为准,讥宋儒之学术荒疏,在这一点上,刘氏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学家。刘氏著《汉宋学术异同论》荟萃汉宋之说,以类区别,稽析异同,讨论得失,厘析汉宋学术异同之后,得出的结论偏向于汉学,因为宋学义理多出于汉学,宋学讥汉学不崇义理,是宋学“忘本之失”。^③所以在刘师培理论中,汉学是宋学之源,汉学,因其讲义理而受尊重。这与“汉学重训诂,宋学重义理”的传统观念形成反差。刘氏拒斥引用宋学皮附义理的肤浅举动,而引汉儒之说阐发义理。刘师培的义理学说,仅由汉注通之,但已不限于传统古文经学所推尊的贾、服、郑三家注,而是转而求之于刘、许、贾、颖之学,刘师培的汉学,言训诂为少,而所言褒贬、义例滋多。

刘师培反对宋儒弃汉儒之例于不论而空衍义理,所以他的汉学研究,着重发明汉儒以条例治经的特点。他说“汉儒治经,恪守家法,解释群经,然治学之方,必求之事类以解其纷,立为条例以标其臬。或钩玄提要而立其纲,或远绍旁搜以覈其信。故同条共贯切墨

① 章太炎《太炎文录》卷2,原载《国粹学报》丁未年第4号(1907年5月31日),题《某君与某书》。

② 刘师培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汉宋章句学异同论》。见刘师培著《清儒得失论》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215页。

③ 刘师培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汉宋义理学异同论》。见刘师培著《清儒得失论》,第213页。

中绳,犹得周末子书遗意。”^①汉儒的条例治经是一种可贵的治学方法。而东汉贾逵、颖容治《左氏》,咸先作条例,近世戴震治经,多有条例,合于汉人之学派,^②犹为刘氏所首肯。所以引汉儒旧说,即多引其条例之内容,自是刘师培所乐于蹈习的。

刘师培作《左传》义例的研究,亦与整个学术环境有关。晚清治经注重条例。义例治经,即用条例的方法推求微言大义,其最具革新意义的地方在以条例为基础的逻辑化的方法,对专事零碎训诂考证的古文经学做出校正。刘师培看重汉儒治经条例,当受其从兄刘师慎的影响。师慎年长刘师培三岁,刘师培在为刘师慎所写墓志铭中说到刘师慎一生专攻春秋左氏学,喜贾、服、颖等人的义例,^③所以刘师培之重汉人义例,绝非空绝来风。

治经重义例,是今文学兴起之后颇为流行的一种治经方法。刘师培治经,是否受今文学的影响,不得而知。刘师培认为“清代汉学未必即以汉儒治经之法治汉儒所治之经”,^④最显要的区别在于,清代汉学舍弃了汉儒(经古文家亦援条例治经)的条例治经方法。条例治经作为一种方法,对刘师培来说,不仅意味着受经今文学的刺激而起,而且意味着自觉地承继汉儒传统。这种学术自觉,使他偏离了家学,遥承汉儒。1912年,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任教职,曾告诫国学院的学生(蒙文通)曰:“经术有家法,有条例。《诗》《书》者,有家法,无条例。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者,有家法,有条例。”^⑤1913年,他在给别人开具的国学入门书中,除家法的强调之外,还强调义例,煌煌具列今文经学张惠言的易学著作、刘逢禄的公羊学著作,云张氏《周易虞氏义》、《周易荀氏九家义》、《易义别录》“于汉儒易学条例,搜集略备,仅阅此书,其他谈《易》之书均可缓阅”,^⑥于刘氏《公羊何氏释例》下云:“条理秩然,古茂可观”。^⑦看了这份入门书目,人们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刘师培今古文兼采的学术风格相联系,其实,刘师培看重今文学说,最着意处,在其“条例”、“条理”,这是经学所必不可少的,也是每一个识治经门径的人所必定认同的。章太炎认为经师必须具备六种品质,其中之一云“守凡例”,即以条例治经。

刘师培的《左传》义例观,是以否定杜预的义例观为基础的。杜预将《春秋》义例单纯地理解为史例,刘师培认为《春秋》不仅为史书,而且是经书,《春秋》义例,当有史例和国例之分,《春秋》的微言大义,主要存在于国例当中,杜预“谓《左传》凡例即周公所定之《礼经》,是混史例于国例之中也。”^⑧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说杜预褒贬不得《春秋》褒贬之要领,并列举杜预义例之失凡二十条:

杜说之误,属于训诂典制者,其失小,属于义例者,其失巨。爰稽其失,厥有廿端:
以经传为误,一也;经阙,二也;经例文,三也;传写失之,四也;无义例,五也;经直因史成文,经用旧史,六也;书法一彼一此,并仍史旧,七也;史言其实,所书非例,八也;史

① 刘师培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总序》。见刘师培著《清儒得失论》,第209页。

② 刘师培《汉宋学术异同论·总序》。见刘师培著《清儒得失论》,第210页。

③ 刘师培《仲兄许仲先生行状》:“治汉儒经术,殚精《春秋左氏传》,博综贾、服、颖三君条例。”转引自万仕国著《刘师培年谱》,第225页。

④ 蒙文通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《廖季平年谱》附录,第149页。

⑤ 蒙文通《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》。见廖幼平编《廖季平年谱》附录,第149页。

⑥ 转引自万仕国《刘师培年谱》,第217页。

⑦ 转引自万仕国著《刘师培年谱》,第218页。

⑧ 刘师培《读左割记》。见刘师培著《刘申叔遗书》,第301页。

特书,九也;史异词,十也;史略文,十一也;史缺文,十二也;史失之,十三也;经不书,因史旧法,十四也;史承告词、书策,春秋承策为经,十五也;告词略,十六也;书名不书名,从赴,十七也;以某事告故时史因以为文,十八也;不书悉,由不赴,十九也;不书悉,由不告庙,二十也。窃以杜说这误亦有自来。盖由以常识测经,使经说悉趋平易,用是荡汉说之篱藩,抉前儒之阃奥,其旨弥浅,其谊弥乖。上徇师傅,下从经诂,说经之舛,百世莫能解也。^①

二十条意见集中了古文经学对杜预义例的不满,对杜预义例的条条指责,可谓穷形尽相,究其实,二十条意见辐辏于一:杜预以史书看待《春秋》,以史家实录看待《春秋》书法,抹煞孔子的笔削微旨,所明书法,前后横绝,比比皆是。杜预视《春秋》为史而非为经,使刘师培大不满。刘师培力图参考经传前后文,融通旁贯,以明孔子《春秋》一经的褒贬。阐释《春秋》之义的过程中,使用最多的仍是《春秋》经文本身,而《左传》在《春秋》义例的研究中,所起的作用并不大,所以《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》等著作以《左传》为名,实际仍是在直接阐发《春秋》的义例。刘氏家族“以《左氏》之例释《左氏》”的初衷,似乎落空。以刘师培的绝人之姿,尚不能发明《左传》的义例,似足以说明《左传》古文经学的义例研究,在今文学的强大攻势下,捉襟见肘,难以为继。

刘师培《左传》义例研究的意义,在于使刘氏家族及传统古文经学微言大义的追求落到了实处。这个义例,一不来源于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义例,而可标榜为《左氏传》所独有;二不同于今文学家的异议可怪之论,力求平实、系统而有说服力;三不同于与今文学立异的杜预之义例,而来自汉儒旧训,并加以刘氏的阐释和发挥。刘师培的义例研究由此具有双重意义,一藉以与今文学相抗争,二用以终止杜预义例在春秋左传学中的地位和作用。但刘师培的《左传》义例,虽标榜为《左氏传》所独有,但免不了“杂采”、“肤引”今文学之讥,而对杜预义例某些合理因素的抛弃,也使他的义例之学缺少应有的兼容。

义例治经,是东汉后期经师逐渐形成的一种治经方法,它的出现,使经学摆脱了神学的虚妄和讖纬的泥淖。它务使经学摆脱语词训诂的零碎而呈现出一种条理化、逻辑化的说经方式,这是经学的内在变革。随着经学退出历史舞台,古文经学对应对今文学而提出的“义例”的课题,已与我们生疏,离我们远去了。

结语

刘师培对家学的承继与偏离,实际是在今文经学的压力之下,对清代乾嘉汉学的承继与变革。他的偏离——抑或说变革处,都在乾嘉汉学所深讳言的《春秋左传》的义理学,而刘师培在《左传》义理上的建树最终挽回不了经学的穷途末路,而刘师培承继家学,在《左传》传统研究领域——“礼”和“事”上所做的开拓与建树使他有功于清代左传学厥大,足使他立于学者大家之林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罗军凤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710048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^① 刘师培《春秋左氏传例略》。见《刘申叔遗书》,第346页。